

法与术

喻中读韩非

喻中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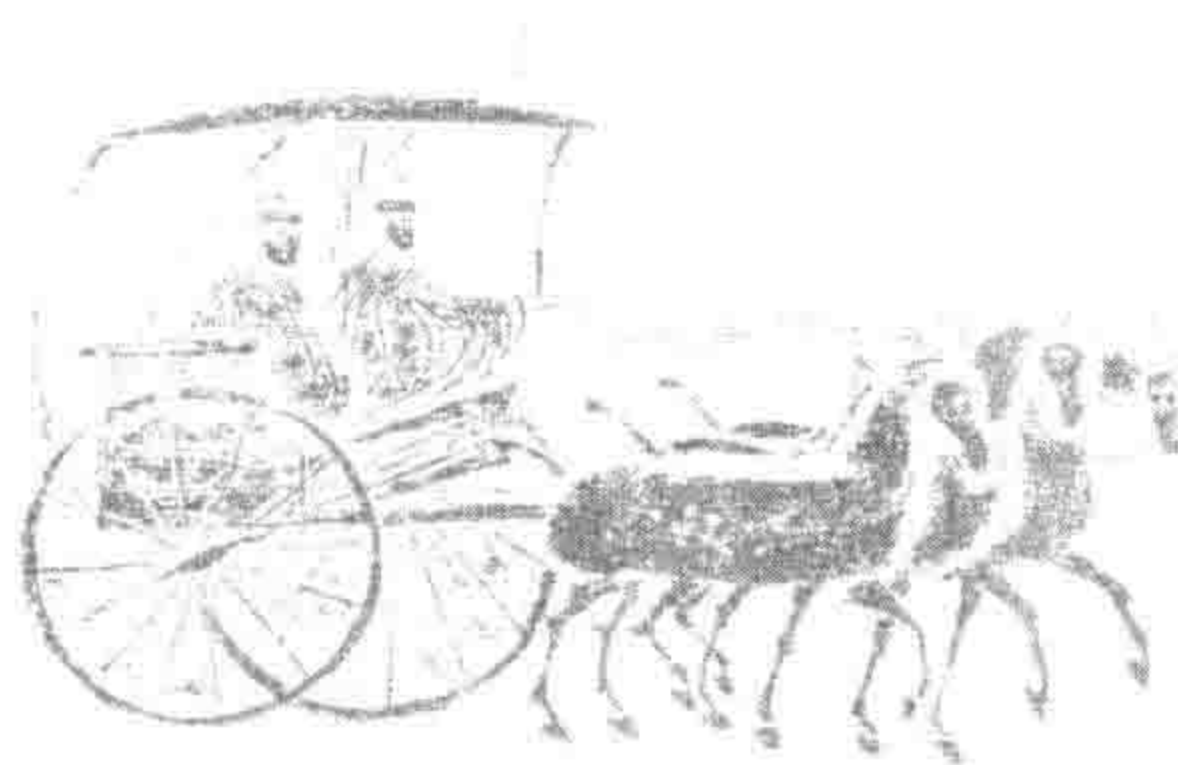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法与术

喻中读韩非

喻中 著

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与术：喻中读韩非 / 喻中著. —北京：中国法制出版社，2018.1

ISBN 978-7-5093-4189-6

I. ①法… II. ①喻… III. ①韩非（前280-前233）-人物研究
IV. ①B226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313179号

策划编辑 / 责任编辑：侯 鹏

封面设计：蒋 怡

法与术：喻中读韩非

FA YU SHU: YUZHONG DU HANFEI

著者 / 喻 中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印刷 /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32开

版次 / 2018年1月第1版

印张 / 7.875 字数 / 179千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

书号ISBN 978-7-5093-4189-6

定价：39.00元

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100031

传真：010-66031119

网址：<http://www.zgfzs.com>

编辑部电话：010-66060794

市场营销部电话：010-66033393

邮购部电话：010-66033288

（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66032926）

喻 中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，著有《法学是什么》《法学方法论》《宪法社会学》《法家三期论》《论授权规则》《中国法治观念》《风与草：喻中读尚书》《在法律思想的密林里》《乡土中国的司法图景》《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》《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权力》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概论》《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》等书。

自序

本书收文五篇，每一篇都是“读韩非笔记”，因此，“读韩五记”可以作为本书的另一个书名。虽然五篇文章的主题都是“读韩非”，但是，各篇重心不同，风格各异。其中，《韩非天下第一》及《韩非思想历程》主要关注韩非子其人，主要是读《史记》之《老子韩非列传》《李斯列传》《秦始皇本纪》《韩世家》及其他相关文献的笔记。《读〈韩非子〉》主要关注《韩非子》其书，是在阅读《韩非子》的过程中写下的笔记。《读〈韩非子评论〉》是关于熊十力《韩非子评论》的读书笔记，旨在透过熊子读韩子。《读〈韩学源流〉》是关于《韩学源流》一书的读书笔记，试图通过韩非学史的梳理，回望韩非精魂历经两千多年的载沉载浮，最终蜿蜒而来的历史轨迹。

2017年10月

目 录

- 第一篇 韩非天下第一 / 001
- 第二篇 韩非思想历程 / 017
- 第三篇 读《韩非子》/ 041
- 第四篇 读《韩非子评论》/ 109
- 第五篇 读《韩学源流》/ 169

- 附 录 韩非学术年谱 / 207
- 后 记 / 241

第一篇

韩非天下第一



1

“那是最美好的时代，那是最糟糕的时代；那是个睿智的年月，那是个蒙昧的年月；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，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；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，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；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，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；我们面前无所不有，我们面前一无所有；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，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——简而言之，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，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，不管它是好是坏，都只能用‘最……’来评价它。”^①

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开篇写下的这段话，正好可以用来描述韩非生活的时代：既美好又糟糕，既智慧又愚昧，既信仰又怀疑，既光明又黑暗，既充满希望又令人无比失望。

就“美好”的一面来说，韩非的时代是中国史上的“轴心时期”，涌现出来的文化巨人非常密集，超过中国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。思想之深邃，精神生活之自由，想象力之宏富，创造力之丰沛，辞章之灿烂，后世的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。这样的时代，难道不是最美好、最有智慧、最令人神往的时代吗？

^① 宋兆霖编译：《狄更斯全集·12·双城记》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3页。

就“糟糕”的一面来说，韩非的时代凛冽而肃杀，是一个典型的丛林世界，一个真正的乱世。何谓乱世？孔夫子临死前七天拖着老病之躯说出的那几句话最为精到。他说：“泰山崩塌了，栋梁毁坏了，哲人凋零了。”^①给人以精神寄托的几样东西全部垮掉了，这样的时代，不正是一个最黑暗、最令人沮丧失望的时代吗？

这是一个既令人特别悲伤，又让人万分欣喜的时代。现代智者弘一法师在临终前写下的“悲欣交集”四个字，恰好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。这番景象，就是韩非诞生之后第一次睁开眼睛所看到的时代画面，所面对的世界图景。

2

韩非生于韩，死于秦，这一点是很明确的。韩非死于公元前 233 年，这一点也是明确的；但他的生年，却是一笔糊涂账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一个比较合理的推算是公元前 295 年。这一年，正值韩釐王元年。

韩非的父亲是谁，史无记载。我们只知道，在韩国宫廷里出生的韩非，是名副其实的王室公子、高干子弟。从小耳濡目染，尽是生动活泼的宫廷政治剧。这样的天时地利，让韩非对于帝王之术，不仅有理论的修养，更有实践的体验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算是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，走出了一条从实践到理论，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成才之路。这就比那些只在体制之外谈权力、说政治的人，

^① 孔子的原话是：“太山坏乎！梁柱摧乎！哲人萎乎！”详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。

更有优势，至少不需要专门去搞调研。

不仅如此，韩非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，那就是，作为荀子的学生，得到了荀子的真传，理论功底比较扎实。既有对宫廷政治的亲历亲见，又有思想名家的指点，再加自己的理论悟性，造就了韩非超越其他人的政治卓识。但是，韩非也有一个让人难堪的毛病，那就是说话结巴，口才相当差。但是，上帝造人还是比较公平的，上帝虽然没有赋予韩非以寻常的演讲术，但却给了他超乎寻常的写作能力与文字表达技巧。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字，是公认的先秦散文的“四大台柱”之一。按照郭沫若的说法，“韩文的峻峭”，与“孟文的犀利，庄文的恣肆，荀文的浑厚”相比，“实在是各有千秋”，^①难分伯仲。

3

与韩非交往较为密切的人，除了上文提及的导师荀子，还有以下几人。这些人大致构成了韩非主要的交往圈子或社会关系；或者说，这些人构成了韩非的生活世界。

一是相对暗弱的两任韩王：早期的韩釐王，以及韩釐王之后的韩桓惠王。当时的韩国积贫积弱，综合国力在“七雄”当中，排名倒数第一。由于长期遭受强秦的欺凌，国土越来越小，国家安全根本就得不到保障。韩国作为“战国七雄”之一“雄”，早已“雄”不起来了。韩非的文章告诉我们，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韩国在秦国面前，根本就不能保持独立国家的自主性，其地位仅仅相当于秦

^① 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》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65页。

国的一郡一县。韩王受辱不说，大臣们也苦不堪言。对于这样的国内外形势，韩非深感忧虑。宗族公子的责任感，驱使他反复向两任韩王上书劝谏，希望韩王运用法术，实现富国强兵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建议并未得到采纳。

二是相对有为的韩王安。这个于公元前 278 年接替桓惠王即位的韩国君主，比较赏识韩非。公元前 237 年，当秦国又一次威胁到韩国的时候，韩王安与韩非在一起研究过削弱秦国的策略。在韩王安即位的第五年，秦军猛攻韩国，在危险的关头，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，这是韩非命运的一个转折点，他由故国迁至敌国，并最终死在那里。又过了四年，韩王安也被秦王俘虏，成了亡国之君，韩国也降格成为了秦国的颍川郡。

三是堂谿公。这是一位韩国的老先生，身世已不可考。我们只知道，他曾规劝韩非要注意明哲保身，不要出风头去搞什么法术，因为那是很危险的：“你不是说过，楚国不用吴起，致使国力衰败；而秦国依靠商鞅，却实现了国富兵强的目标。然而，吴起被肢解，商鞅被车裂，都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你又何必步他们的后尘呢？”^①但是，韩非表示，建章立制，有利于国家与公众，因此愿意一往无前，颇有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趋避之”的豪迈胸襟。

四是秦王嬴政。当他还没有见到韩非的时候，他是韩非的仰慕者，是韩非的粉丝。当他把韩非留在秦国之后，事实上又把韩非拖

^① 堂谿公的原话是：“臣闻服礼辞让，全之术也；修行退智，遂之道也。今先生立法术，设度数，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。何以效之？所闻先生术曰：‘楚不用吴起而削乱，秦行商君而富强。二子之言已当矣，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，不逢世遇主之患也。’逢遇不可必也，患祸不可斥也。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，窃为先生无取焉。”详见《韩非子·问田》。

入了秦国的宫廷政争之中。韩非身陷其中，终于不能自拔，最后死在秦王嬴政的手上。

4

跟以上几个人相比，更深刻地左右了韩非命运的人物是李斯。这也是一位名人，在政治上很活跃，政治手腕比韩非还老辣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专列一卷为其作传，这个待遇，比韩非高，比老子、庄子也高。

李斯本是楚国人，年轻时当过楚国某地方政府的小科员。后来跟随荀子学习帝王术。正是在荀子那里，他认识了作为同学的韩非。他读了韩非的文章后，只能自叹不如。嫉妒与陷害的种子，很可能就是在那一刻种下的。

李斯完成学业后，发现楚王成不了什么大事；除了秦国，其他国家也不怎么样。为了摆脱卑贱和穷困的人生，李斯告别荀子，来到秦国寻找进一步发展的机会。这就相当于现在的有志青年，在贫困的家乡找不到用武之地，就去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或深圳。李斯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。他来到最强大的秦国之后，首先投奔做丞相的吕不韦，通过吕不韦的关系，总算找到了游说秦王、表现自己的机会，并得到了秦王的信任，在秦国的政权体系中，获得了一席之地，从长史、客卿、廷尉，最终升至丞相的高位。

公元前 234 年，秦王政读到了韩非的名篇《孤愤》《五蠹》，很受震动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哎哟，我要是能见到这等人物，要是有机会跟这样的高人交往，死了都愿意。”李斯一听，赶忙解释说：“这些文章都是我的同学韩非写的。”秦王嬴政一听，高兴了，原来这位

高人就在韩国，那还不容易！于是挥师伐韩。在大兵压境的情势下，韩王安派韩非出使秦国。

韩非来到秦国之后，提出的政见是保存韩国，当即遭到了李斯的反对。秦王也无法赞同。其间，韩非还在秦王面前说了权臣姚贾的坏话，这就引起了李斯与姚贾的合谋陷害。他们两人对秦王说：“韩非这个人，毕竟是韩国的宗族公子，始终都在谋求韩国利益的最大化，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为秦国着想，留着，永远都是个祸害，还不如把他诛杀了，更有利于维护秦国的利益。”^① 秦王听信了这番话，同意把韩非交给狱吏去惩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，让他自杀。韩非不愿死，他想向秦王申诉，但未能如愿。等到后来秦王反悔了，派人去赦免韩非，韩非却早已死在秦国的监狱中了。

看来，韩非确实是一个精于谋国而拙于谋身的人。他洞悉并阐述了宫廷权术的奥秘，为君主支了无数的高招，但却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，悲夫。

5

韩非的一生，思想大于行动，立言胜过立功。因此，要认识韩非，从思想与文字着眼，能够更准确地描绘出韩非的肖像。

在先秦时期一流思想家群体中，韩非对于政治实践的介入最深。

^① 李斯、姚贾的原话是：“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，非终为韩不为秦，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归之，此自遗患也。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详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。

他生于韩国宫廷，死于秦国宫廷，从这个君主身边辗转到那个君主身边，因此，韩非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也是最准确的。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格，为韩非的思想与文字打上了冷峻的色彩。如果与其他学派稍作比较，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了。

先看韩非与儒家的关系。如果说韩非是冷峻的，那么孔孟就是温热的。冷峻的韩非注重现实的利害关系，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；温热的孔孟重义而轻利，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。韩非的现实与冷峻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，满足了精明的君主们的需要，所以，秦王一读到韩非的文章，就产生了“甚合我意”之感。可见韩非的话，是说到君主们的心坎上了。与之相映成趣的是，孔孟的理想主义，因为过于高超，往往令各国君主敬而远之，因为不好用啊。所以，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，在奔走于各国的路途中，几乎处处碰壁，最后只落得个无功而返。原因不在于他们的运气不好，而在于，他们兜售的东西只适合写在旗帜上；只有韩非的东西，才能够为君主们提供真正的行动指南。所以，孔子与孟子的简历，大致都可以归结成一句话：游说各国君主不成，最终只好寄身于教书先生的行业。至于韩非，则是君主们争抢的对象，韩王安舍不得，秦王政非要不可。反差如此之大，原因只在于，孔学与韩学的精神不同：孔学体现了“善之渴望”，是“向善之学”；韩学体现了“真之追求”，是“求真之学”。

当然，在儒家的系统中，还包括上文提到的荀子。他是韩非的老师。他没有孔孟那样浓厚的理想主义。他是儒家的现实主义者，但又不像他的学生韩非那样冷峻。他的学说虽然出于儒家，但又广泛汲取了百家的智慧——尤其是法家的智慧，因而可以视为儒家与法家共同孕育出来的混血儿。这是荀子的优点，但也可以说是一个

缺陷：个性不够突出。不像孟子，善养浩然之气，调门提得老高，因而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、纯粹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；也不像韩非，只说利与害，只讲权与术，酷就酷到底，从而为丛林世界中的血腥竞争提供了技术指导。高又高不上去，低又低不下来，这就是荀子悲剧的根源。两千多年来，韩非是君主们真心喜欢的，因而他永远活在君主们的心里；孔子是君主们假装喜欢的，因而他永远活在君主们精心建造的庙里。荀子就不行了，虽然当过几天齐国社会科学院院长，但也只是和一群书呆子厮混罢了。晚年寂寞，死后荒凉，吃不上冷猪肉，闻不到香烛气，真应了屠格涅夫在《门槛》中写的那句话：“甚至任何人都不会知道，该悼念的是何许人。”^①

6

如果说，韩非与儒家的关系明白而清晰，那么，韩非与道家的关系，就比较复杂了。因为道家理论主要有两种指向：阐释帝王之术的《道德经》与寻求精神自由的《南华经》。它们都可以归到道家这面旗帜之下，但旨趣差得很远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讲的是人君南面术，是韩非理论的源头；韩非的著作，可以在整体上看作是对《道德经》的进一步阐述，套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对《道德经》的继承与发展。《道德经》中的道与德，绝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道德，那个时候，道与德是同义词，按照东汉郑玄的说法，就是无为的意思。按照当代学者张舜徽在《周秦道论发微》一书中的说法，《道德经》所宣扬

^① 屠格涅夫：《玫瑰——屠格涅夫散文诗集》，张铁夫译，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8页。

的人君南面术，就是教君主们如何装腔作势、装模作样，核心就是一个“装”字。^①就现在的标准而言，所谓《道德经》，恰恰是最不讲道德的经，而是讲权术、讲利害、讲谋略的经。

与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一样，庄子的《南华经》也讲无为，但重心是个体的自由，是个体的后退、撤退。无为的目的，是让自己无拘无束，舒服自在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：楚威王听说庄子有智慧、有学问，名气很大，就派人给他送了一个很大的红包，说是愿意聘他做楚国的宰相。这样的机会，如果换了孔子或孟子，恐怕会喜出望外，乐颠颠地赶了去上任。但庄子却只愿说不。他告诉楚威王的使者：“你们给的金钱确实很多，你们给的官位确实也很高。但是，你们看看祭祀用的那头牛，精心地饲养了好几年，让它吃好喝好，再加上精心的装扮，却要送到太庙中去当供品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它即使想变成荒野中的孤豚，也都不可能了。所以，你们还是快走吧，不要来麻烦我，我宁愿在荒野的泥泞中爬行，也不愿成为太庙中的供品。”^②这样的价值取向，与韩非的权术相比，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当然，庄子与韩非也有交叉的地方。因为庄子在阐述人生哲学的同时，也论述了他对于政道与治术的看法。譬如，他也认为君主应当无为，只有无为才能治天下。这些主张，与韩非的政治理论，

① 张舜徽：《周秦道论发微 史学三书平议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，第 15 页。

② 庄子的原话是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详见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。